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
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

马戎
主编

THERE IS ONLY ONE CHINESE NATION:
A DEBATE ON THIS ISSUE IN 1939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丛书主编 / 马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丛书主编 / 马戎

『中华民族
是一个』
——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

马戎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 / 马戎主编.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0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9199 - 8

I. ①中… II. ①马… III. ①民族问题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33.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9023 号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

——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

主 编 / 马 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责任编辑 / 杨桂凤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编辑部 (010) 59367159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0.5 字 数：327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199 - 8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2016

目 录

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

——回顾 1939 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

（代引言）	马 戎 / 1
“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	顾颉刚 / 29
中华民族是一个	顾颉刚 / 34
读了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后	张维华 / 45
论边疆教育	吴文藻 / 48
《来函》	白寿彝 / 52
中华民族与回教	孙绳武 / 55
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	费孝通 / 62
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	马 毅 / 69
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	顾颉刚 / 73
来函两封	鲁格夫尔 / 84
名词的讨论	
——关于“国家，民族，华北，华南”等	方 豪 / 87
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	顾颉刚 / 92
用历史的观点对鲁格夫尔先生说几句话	徐虚生 / 102

再论中华民族与回教	孙绳武 / 108
云南没有民族问题	陈碧笙 / 115
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	胡体乾 / 119
致朱家骅、杭立武	傅斯年 / 126
论所谓汉族	杨向奎 / 128
国族政策与民族研究之分类与关系	杨成志 / 131
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	
——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	翦伯赞 / 139
我为什么写“中华民族是一个”？	顾颉刚 / 150
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	
——在伊斯兰学会的讲演词	顾颉刚 / 157
顾颉刚先生百年祭	费孝通 / 163
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	周文玖 张锦鹏 / 169
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	
一个”的论争	黄天华 / 188
吴文藻与民国时期“民族问题”论战	王炳根 / 212
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	
历史考察	黄兴涛 / 223
徘徊到纠结：顾颉刚关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解	
——读《顾颉刚日记》随札之一	葛兆光 / 288
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民国时期改废国内各族称谓的历史考察	娄贵品 / 296

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

——回顾 1939 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
(代引言)

马 戎

一 有关“民族”一词的用法

关于“民族”(nation)、“族群”(ethnic group)等用语定义和翻译方法的讨论,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民族问题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

长期以来,“民族”一词被同时应用在“中华民族”和 56 个“民族”这两个层面上,“民族主义”也被同时应用在全体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和与 56 个“民族”相关的“地方民族主义”这两个层面上,而这两个层面的政治内涵和社会意义完全不同,在这两个层面上混用同一词,给国人对这些词的理解和对外翻译带来了一些问题。21 世纪是中国社会结构实现转型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外部面临极为严峻的竞争态势,内部也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渗透到边疆地区而出现大量复杂的社会矛盾。为了增强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软实力,在 13 亿国民中加强

* 本文最初发表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 年第 5 期,第 1~12 页;此为修订稿。

“四个认同”（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伟大祖国，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成为当务之急。正因如此，对在“民族”这个核心概念上出现的意见分歧需要及时加以厘清。

2000年，我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上发表的《关于“民族”定义》一文中指出，汉文的“民族”一词“在应用于我国的少数民族时，在实际内涵方面与英语的‘Ethnicity’或者‘Ethnic groups’较接近”（马戎，2000a：7）。同年我在《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上发表的《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有关术语的使用给出了两种选择：“第一个是从‘国族’的新角度来使用‘中华民族’这个习惯用语，同时保持56个‘民族’的称呼；第二个是‘中华民族’的称呼不变，以便与英文的‘Chinese nation’相对应，而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以与英文的‘ethnic groups’相对应，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有助于把在使用中相互模糊混淆的词明确区分开。”（马戎，2000b：135）

2001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上发表的《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中再次建议我们考虑“在用语上进行一些调整，如采用国内一些研究者的观点，把‘中华民族’译成英文的‘Chinese nation’，使‘民族’与‘nation’对应起来；同时把‘少数民族’改称为‘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从而把这些侧重文化和血缘意义的‘族群’与英文中的‘ethnic groups’对应起来，而对56个原来称为‘民族’的群体称为‘族’（如汉族、蒙古族，而不再称‘汉民族’、‘蒙古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的56个族群’”（马戎，2001：149）。

2004年，我在《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上发表的《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一文中重申了这一建议，并给出三个理由：“一是我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在社会、文化含义等方面与其他国家（如美国）的少数种族、族群（Racial and ethnic minorities）是大致相对应的，改称‘族群’可以更准确地反映我国民族结构的实际情况；二是可以避免在两个层面（‘中华民族’和下属各‘民族’）使用同一个词所造成的概念体系混乱；三是当我们讲到中国的56个‘民族’和‘地方民族主义’并把这些词译成英文的Nationalities以及Regional nationalism时，国外的读者从这些英文词中很容易联想为有权利实行‘民族自决’并建立

‘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某种政治实体和分裂主义运动，这样的话语调整可以避免在国际社会造成严重误导。”（马戎，2004：123）

在我提出以上涉及“民族”定义和用词调整的建议后，在国内一些报刊上引发了讨论和批评。有些人认为这将牵涉我党历届领导人讲话和政府文件中许多传统用语的调整，有些人担心如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就会“矮化”中国各少数民族并危及中国的民族平等，有些人担心这将会使人们质疑当前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合法性。同时，也有些人认为中国语境中的“民族”既不同于“nation”也不同于“ethnic group”（族群），建议使用汉语拼音“minzu”来解决“民族”的英文翻译问题（郝瑞，2010；纳日碧力戈，2000：121）。考虑到“民族”一词在“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两个层面同时使用所造成的重复与概念混乱，还有学者认为56个“民族”才是真正的民族，应当废弃“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建议“‘中华民族’一词只在作为复数的‘中华各民族’的含义时使用，而在其他场合放弃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改用毫无争议的、与公民共同体含义重叠的‘中国人’”（都永浩，2010）。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假如接受这样的观点，只承认56个民族并否认中华民族的存在，那么这样的术语调整所涉及的范围将会多么广泛，所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又会引起多少新的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不仅中国目前的国歌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要调整，抗战时期的文献要重新注释，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重要文件的用词需要重新调整，甚至民国和抗战时期的整个历史也需要重写。假如根本不存在中华民族，那么“满洲国”就是满洲民族在外部势力支持下进行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十三世达赖的“驱汉”和英国主导的“西姆拉会议”提出的“内藏”、“外藏”划分完全具有正当的合法性。依此类推，20世纪的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需要重新定位。

毫无疑问，对我所持观点的批评以及各种不同意见都是有一定根据的，其主要根据就是官方确认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以及国内民族理论界长期宣讲的斯大林“民族”定义和我国中央人民政府于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我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许多领域学习苏联经验是十分自然的。一方面，从西柏坡来到北京的党中央确实缺乏治理这个庞大国家的经验，而“二战”中战胜了德、日两大法西斯国家

的苏联很自然地成了新中国在各领域学习和效仿的成功榜样；另一方面，由于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然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只能“一边倒”。毛泽东说“良师益友是苏联”，新中国在许多领域几乎是全面学习苏联的体制和建设经验。在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应当说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时中央政府所能够做出的最佳选择。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理论研究把斯大林著作视为马列主义经典，在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参与下，在全国各地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参照苏联的做法在每个中国公民的身份证上明确标示出“民族”身份。尽管中国没有效仿苏联的联邦制，但是我们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为基础并以当地少数民族命名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以少数民族成员群体为对象实施了一系列民族优惠政策，建立了与普通学校平行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民族体制和民族政策的影子。

在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后的今天，我国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文化大革命”后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发生了变化，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和“不断革命”；第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的经济体制和就业体制发生了变化，从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转型为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体系；第三，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以“民族”为单元发生了政治解体，其他东欧国家也出现了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型；第四，极力围堵和分化中国的各种国际反华势力活动日趋活跃，直接介入我国一些地区的民族分裂活动；第五，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出现了一些带有民族色彩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如 2008 年拉萨“3·14”事件、2009 年乌鲁木齐“7·5”事件），在一些地区和一些群体的“民族”认同意识方面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但是，政府部门仍然有别的坚持，许多长期研究民族理论的学者仍在简单地引用列宁、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或者不断重述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党中央历次会议的文件，对那些要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坚持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的社会实践进行反思的呼吁进行打压。这些做法不免让人回想起改革开放初期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两个凡是”的政治立场。我们觉

得，拒绝反思的态度与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的改革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也无助于我们认识和分析当前中国在民族关系方面出现的新现象与新问题。

在这个新的世纪，我们面对的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非常有必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精神，对造成这些事件的多种社会原因和民族意识基础进行深入的分析，同时拓展眼界，努力借鉴历史经验和世界各国处理种族/族群关系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以“实事求是”和负责任的态度，对我国60多年来坚持的传统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制度与政策的实践效果进行反思。我们提出要“反思”，绝不是简单地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的民族工作，只是希望通过对这些制度、政策的实践效果进行分析和思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努力“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总结经验和教训，努力避开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二 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

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出现的这场围绕“中华民族”定义、我国各少数民族是“民族”还是“族群”的讨论，经常使我回想起70多年前在中国学术界发生的另一场类似的讨论。

1. 顾颉刚先生在《益世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

在1938年12月也就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历史时期，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云南昆明创办《益世报·边疆周刊》。顾先生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中华民族是一个》。他在文章中明确提出，以现代的政治观念来看，在中国只存在一个“中华民族”，人们常说的“五大民族”等，都不宜称作“民族”，而且把中国的汉、满、蒙、回、藏等群体都称为“民族”，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分化和瓦解中国的策略和阴谋。在日本已经建立伪满洲国和正在鼓动“内蒙古自治”的严峻形势下，顾先生的担忧绝不是毫无根据的。这篇文章发表后，随即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定义的学术争论。一些学者对顾先生的观点表示支持和商榷，特别是刚从英国学习了西方人类

学回国不久的费孝通先生，撰写文章明确表达了不同意见，顾先生为此又专门写了两篇文章，予以作答。

我对这一讨论的关注，源于2008年12月26日在《中国民族报》上读到记者赵志研的一篇述评《“中华民族是一个”？——追记抗战初期一场关于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辩论》。这篇述评的题目引起我极大的兴趣，随后我便找到顾颉刚先生的这篇文章，读后受到很大触动。我不仅同意顾先生的基本观点，也深深地被他的一腔爱国热忱感动。随后，我又读到周文玖、张锦鹏两位先生在《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上发表的《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一文，得知傅斯年完全赞同顾颉刚先生的观点。傅斯年认为中华民族虽在名词上有汉、满、蒙、回、藏等族，但事实上实为一族。他说“汉族一名，在今日亦已失其逻辑性，不如用汉人一名词。若必言族，则皆是中华民族耳”（周文玖、张锦鹏，2007：26）。由于傅斯年自1928年起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1937年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对当时的学术界和国民党政府的影响很大，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傅斯年的观点对1943年出版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中提出的“中华民族宗支论”^①很可能也有一定影响。

与“中华民族”一词相关的是“中国本部”的提法。这一提法在当时也广为流行，顾先生认为这一概念的流传危害极大。因此顾先生在《益世报·星期论评》（1939年1月1日）上首先发表了《“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一文。两篇文章的主题紧密相扣。

在这篇文章中，他说：

我们觉得最痛心的一件事，乃是帝国主义者造出了几个分化我们的名词，传播进来，我们上了他们的当，随使用了。大家日日在嘴里

^① “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由于上述，可知中华民族意识的坚强，民族力量的弹韧，民族文化的悠久博大，使中华民族不受侵侮，亦不侵侮他族。惟其不受侵侮，故遇有异族入据中原，中华民族必共同起而驱除之，以光复我固有的河山。惟其不侵侮他族，故中华民族于解除他互相轧辄互相侵陵的痛苦与祸患的同时，能以我悠久博大的文化，融和四邻的宗族，成为我们整个民族里面的宗支”（蒋介石，1943：2，5）。

说，又在笔下写，这几个名词就起了极大的分化作用，仿佛真把土地和人民划成了若干部分，要做团结的功夫就增加了许多困难。这不能不责备我们知识分子的糊涂，以致国家陷于空前的危险。（顾颉刚，1939a）

外人称我们的满洲为 Manchuria，称满人为 Manchus，称蒙古为 Mongolia，称蒙人为 Mongolian，称新疆为 East Turkistan，称回民为 Moham-madans，而称我们的十八省为 China Proper，称汉人 Chinese^①，简直把我国裂成五国，而屏满蒙回藏于中国之外！我们以前的名称是西域，现在的名称是新疆省，他们都不用，偏称为“东土耳其斯坦”，很清楚地要使它联接西边的土耳其而疏远东边的本国政府。（顾颉刚，1939c）

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面临的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传统的“华夷之辨”和“天朝秩序”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黯然失色，并迅速失去了话语主导权，不仅是对西洋社会和“外交事务”的解读，甚至连涉及中国内部事务的许多概念、人们的观念和用语也受到外国话语体系的影响。所以顾先生说“帝国主义者造出了几个分化我们的名词，传播进来，我们上了他们的当，随便用了。……起了极大的分化作用”。清末民初，特别是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之后，开办新式学堂成为风气。而建学校就需要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大多直接译自国外同科目的教材，由于日文教科书中大半是日本汉字，翻译起来快捷简便，所以中小学教材多译自日文。在当时内忧外患汇集交错的危急年代，对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及用词，又如何可能在短短时间内慎重和仔细地加以审查与推敲呢？所以一些帝国主义者用以分化中国的一些名词和概念，便得以借着这些教科书和其他印刷物进入中国并广泛流传。在顾先生最为痛恨的外来概

① 今天许多国外学者仍然坚持在英文著述中把汉人称为“Chinese”，和藏人“Tibetan”、蒙古人“Mongolian”并列。这意思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藏人“Tibetan”、蒙古人“Mongolian”不是“Chinese”，即不是中国人，推演下去的逻辑是：西藏、内蒙古等不是中国领土。如果今天我们国内学者对这种分裂中国的民族话语仍然熟视无睹、习以为常，浑然接受，那就真真太可悲了。顾先生若能活到今日，将不知做何感想。

念当中，首推“中国本部”。

“中国本部”这个名词，究竟创始于谁的笔下？此间书籍缺少，无从稽考，只知道我们的地理教科书是译自日本的地理教科书，而这个名词就是从日本的地理教科书里抄来的。现在我们把这个杜造的责任加在日本人的身上，决不冤枉。我们只要看他们的首相田中义一给昭和天皇的奏章上说，“兹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中国之领土，亦非中国的特殊区域，我矢野博士等尽力研究中国历史，无不以满蒙非中国之领土，此事已由帝国大学发表于世界矣”，就可见出日本的博士们是怎样的伪造历史或曲解历史来作窃夺我们的土地的凭证，而帝国大学把他们所造的谣言发表于世界也就是用作侵略的前驱，并不是提倡纯正的学术研究。自从明治天皇定下政策，打算征服中国必先攫夺满蒙，便硬造出“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析出边疆于本部之外，拿来欺骗中国及世界人士，使得大家以为日本人所垂涎的只是“中国本部”以外的一些地方，并不曾损害了中国的根本。譬如一个人捉到一只蟹，把它的八条腿折断两条，它固然伤了，却不是致命之伤。如此中国人觉得尚可忍受，外国人觉得尚可原恕，而日本人的阴谋就得成遂，九一八的事变于是乎在充分准备之下显现了。

西洋人承受了日本杜造的名词，亦译“中国本部”为“China Proper”，这或者是不谙悉远东的历史而有此误会，或者也含些侵略的心思而有意替他们推波助澜，仿佛说，你既吃了蟹腿，我何妨也折两条尝尝，反正不致马上断送它的生命的。所最不该的乃是我国的知识分子，自己尽量受他们的麻醉还不够，更替他们到处宣传，弄得这四十年来我国人自己著作的许多史地书里无不写上“中国本部”这个名词，习非成是，只要受过小学教育的同胞们的脑髓里也无不深印着这个名词，住在十八省中的人民的眼光只注在“本部”，而许多边疆地方真就渐渐地不成为中国的领土了！因为这样，所以田中的奏章上又说，“因我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正当，故中国学者无反对我帝国大学之立说也。”唉！中国学者，中国学者，你们无论在知识上、在良心上都真不反对矢野博士研究的结果吗？所以我说：

我们最痛心的不是九一八和八一三，只有学者们的不耐烦思索，以学得几个新名词为时髦，又相率轻信不疑，引起了民众的随声附和，直至中了敌人的诡计，危害了国家的前途而尚不觉察，才是真正该痛心的事实！（顾颉刚，1939a）

顾先生认为“中国本部”一词来自日本地理教科书，随后欧洲人又从这个名词译出英文的“China Proper”。究竟是欧洲的“China Proper”在先，还是日本地理教科书中的“中国本部”在先，已很难考证。这一点并不重要，无论“西洋”还是“东洋”，总之都是些一心要灭亡和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在我们今天读到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英文著述中，“China Proper”仍时有出现。那么，我们今天的中国译者在把这个词译为中文时，是否又回到日本地理教科书的汉字“中国本部”^①呢？这些21世纪的中国译者和读者，是否知道在1939年顾先生对这一名词曾是如何痛心疾首？

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顾先生开篇明义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他强调指出：“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中华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现在汉人的文化，大家说来，似乎还是承接商周的文化，其实也不对，它早因各种各族的混合而渐渐舍短取长成为一种混合的文化了。”（顾颉刚，1939b）顾先生举出大量事例来佐证这一观点，认为“所以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的人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顾颉刚，1939b）。“中华民族”包括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所有的“汉”和“非汉”群体，他们共享一种经千年相互交流融合而成的“混合的文化”，这种文化

① 《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0, Late Ch'ing, 1800-1911*）1993年中译本的“出版说明”中特别提到，“它（本书）也有某些提法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例如，正文和插图中有所谓‘中国本土（本部）’、‘满洲’、‘清朝治理区’等等说法，我们均照字面直译，未加改动。不言而喻，这决不表明中文版编译者同意这些提法”（费正清，1993：1）。这表明了中文版编译者的态度。但我要问的是，在这本中译本的读者中，能够有多少人去会阅读并记住“出版说明”中的这段话呢？读者们在阅读后会不会不自觉地自己的写作中使用“中国本土（本部）”的说法呢？

只能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顾先生在此也明确表示反对狭隘的汉民族主义。

我们被称为汉人的，血统既非同源（可以说国内什么种族都有，亚洲的各种族也都有），文化也不是一元的，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我们决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以前没有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时，我们没有办法，只得因别人称我们为汉人而姑且自认为汉人，现在有了这个最适当的中华民族之名了，我们就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的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顾颉刚，1939b）

顾先生指出所谓“汉人”的血统极为混杂，对于这一观点，一般没有疑问。但是否需要舍弃在民众中习用已久的“汉人”称呼，还是可以讨论的。如果我们参考费孝通教授在1988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路，那么，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并不需要否认或废弃在“多元”层面上的“汉人”和其他群体的称谓。“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高层次的民族可以说实质上是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费孝通，1997：10）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政府中就揭出“五族共和”的口号，又定出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来。这五色旗是再显明也没有了，全国的人民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深深地印在脑里，而且把“红、黄、蓝、白、黑”和“汉、满、蒙、回、藏”相配，就使得每一个国民都知道自己是属于那一种颜色的。这种国旗虽只用了十五年便给国民政府废止了，但经它栽种在人民脑筋里的印象在数十年中再也洗不净了，于是造成了今日边疆上的种种危机。

这恶果的第一声爆裂，就是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决”的名义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而硬造一个伪“满洲国”。继此以往，他们还想造出伪“大元国”和伪“回回国”。（顾颉刚，1939b）

在文章结尾处，顾先生再次呼吁：

我们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但我们仍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和各地原有的风俗习惯！

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倘使我们自己再不觉悟，还踏着民国初年人们的覆辙，中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来谈我们国内有什么民族什么民族，眼见中华民国真要崩溃了，自从战国、秦、汉以来无形中造成的中华民族也就解体了。从前人的口中不谈民族而能使全国团结为一个民族，我们现在整天谈民族而反使团结已久的许多人民开始分崩离析，那么我们岂不成了万世的罪人，有什么颜面立在这个世界之上？（顾颉刚，1939b）

据我们访谈的许多老人回忆，在“民族识别”工作之前，各地许多群体尽管在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这些差异并不带有政治性含义，这些群体也不把彼此视作不同的“民族”，他们之间的“边界”也十分模糊，更不认为彼此之间的差异全面地体现在“地域、语言、经济、文化与心理认同”这些“民族定义”的必要领域中，自然也不必然牵涉法律、政策上的不同地位和待遇。换言之，就是至少在全国广大地区，人们“口中不谈民族而能使全国团结为一个民族”。而在进行了“民族识别”并给每个人确定一个官方的“民族身份”后，自治区域的争取和民族优惠政策的实施不断在增强各自的“民族意识”和维护本民族“地域、语言、经济、文化与心理认同”这些民族特性的自觉性。“我们现在整天谈民族而反使团结已久的许多人民开始分崩离析”，顾先生1939年对此所发的感慨，难道对思考当今民族问题的我们就一点启发也没有吗？

2. 费孝通先生的不同观点

在读到顾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这篇文章后，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刚刚回国的费孝通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投给《益世报·边疆周刊》，文章题目为“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他在文中对

顾先生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

从今天的学科视角来看，这次对话是一位在中国成长的历史学家和一位由西方培养的人类学家之间的对话。西方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就是处于“未开化或半开化”状态的野蛮人群体，他们的田野调查的内容就是对这些群体的方方面面进行考察、描述和类别分析。在远赴英伦之前，费先生曾在清华大学史禄国教授（S. M. Shirokogoroff）的指导下学习体质人类学，并运用这套知识体系在广西大瑶山对当地瑶族进行田野调查。受到西方人类学熏陶的费孝通先生，很自然地认为汉、满、蒙、回、藏、苗、瑶这些有不同祖先、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群体都应当被看作“民族”。

人类学家们在考察和研究人群时，一是对其文化传统的重视超过对其政治认同的重视，二是对不同人群之间差异的重视要超过对他们之间共性的重视。而传统的历史学家首先关注的是政治史，国家和朝代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在1939年已经46岁并因发表《古史辨》而在中国史学界很有影响的顾颉刚先生，对于统一的中华民族演变历史的文献非常熟悉，对于中国是一个政治实体的认识也是根深蒂固的。而1938年刚刚走出学校大门、年仅29岁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则更多地受到史禄国教授、马林诺夫斯基教授的西方人类学传统的影响，自然会十分强调群体之间各种差异的重要性，担心人们会忽视这些人类学家最关注的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多样性。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主题，70多年前发生在年龄阅历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研究经历不同、关注重点不同的两位学者之间的对话，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超越具体观点、非常重要的启示。这两类不同学术传统和关注取向之间的对话，其实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顾先生自然也深深感到学科取向之不同，但是他“愚诚”地希望中国人类学家们在遵奉西方人类学传统的圭臬时，也能够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关心一下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边疆地区的族群关系走向和国家分裂的现实风险，这才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和人民应负的责任。他在回答费先生的文章中殷切地呼吁：

我敢率直奉劝研究人类学和人种学的人，你们应当从实际去考定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种族，不应当听了别人说中国境内有五大民族，